

[美] 梅尔文·P·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著

孙阅欣 廖蔚莹 朱正 王敏 钟远◎译

孙阅欣◎校

人心之争

美国、苏联与冷战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上海
著名
商标
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 梅尔文·P·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著

孙闵欣 廖蔚莹 朱正 王敏 钟远 译

孙闵欣 校

人心之争

美国、苏联与冷战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上海市
著名商
标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美)莱弗勒(Leffler, M. P.)
著;孙闵欣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5617-7567-7

I. ①人… II. ①莱…②孙… III. ①美苏关系—冷战—
研究 IV. ①D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208 号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

撰 著 梅尔文·莱弗勒
翻 译 孙闵欣 廖蔚莹 朱 正 王 敏 钟 远
校 订 孙闵欣
责任编辑 夏海涵
审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31.75
字 数 58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567-7/K·323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By Melvyn P. Leffler

Copyright © 2007 by Melvyn P. Leffl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496号

编辑委员会

名誉编委：

- 美方：约翰·卡斯廷(John Casteen)：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小亚瑟·加森(Arthur Garson, Jr.)：弗吉尼亚大学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
卡伦·赖安(Karen Ryan)：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莫里·D·麦金尼斯(Maurie D. McInnis)：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项目主任

- 中方：俞立中：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张春柏：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陈舒：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

执行编委：

- 美方：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布拉德利·里德(Bradly Reed)：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俞晓明(Xiaoming Yu)：弗吉尼亚大学非洲裔美国人事务副主任
- 中方：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利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刘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译丛序（一）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

我谨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中国读者推出由弗吉尼亚大学相关作者撰写的一些美国研究最杰出的学术著作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研究传统可追溯到她的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81至1782年间写的《弗吉尼亚纪事》是理解美国的第一次和最全面的尝试，这是当时他为了回答一位外国朋友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撰写的。后来在杰斐逊成为合众国总统之后，他发起了横越美国大陆的第一次探察活动——“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一直努力沿着杰斐逊的脚步，试图更深刻地理解美国。

中美之间有着极大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差异，而这些差异为相互学习创造了机会。值得庆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有关美国的这套丛书，我期望弗吉尼亚大学在增强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也能够做出她的贡献。

约翰·卡斯廷
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译丛序(二)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介绍纷至沓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使得我们对之倾注了更多的兴趣、更多的关注。但在许多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关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其实我们仍然了解得不多或很不深刻。许多时候,那一个我们看似十分熟悉的国度,深入其中之后又显得那么的新奇。历史轨迹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竞争,诸多因素的驱动,使得不同国度之间的合作交流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可能。

我们推出的这部“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是以美国研究为主题,选取了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历史系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了美国的历史、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社会现状以及外交政策等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美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深层次的剖析与反思。本丛书为中国的美国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研究范式,为理解和贯彻执行中美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我相信这部丛书一定有助于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学习美国、批判美国,从而更加客观地对待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的出版,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VA)与华东师范大学(ECNU)合作交流的成果。弗吉尼亚大学是由美国第三届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杰斐逊创建的,她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并以激发学生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过程中持久的自由探索精神,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为宗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取得了诸多优秀的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继承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几代人秉承“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坚持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己任,砥砺培育英才,致力服务社会,积淀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我们两所大学不仅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合

作交流关系。从新千年伊始,华东师范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深入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启动了若干国际合作项目,推进了人员的交流与资源共享,密切了两校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了将两校的合作成果惠及广大的读者大众和学术群体,两所大学决定合作出版“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这部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是两个大学之间合作交流的大事,也是中美文化合作交流事业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了推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交流,我们还会将这些著作的作者纳入正在进行的教师交换项目之中,努力为促进中美文化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的交流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的出版,倾注了弗吉尼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许多专家学者的热诚,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出版了大量介绍其他国家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译丛以及众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并以此种方式承载着了解世界的责任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承的重任。借此机会,我代表丛书编委会对所有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立中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致谢

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准备本书的写作工作,许多研究机构和个人都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当我需要从高校的管理职责中脱身进行本书的学术研究时,国家档案馆和马里兰大学向我提供了联合奖学金,我得以仔细研究存放于 Archives II 的众多美国官方资料。同年,即1995—1996年,我得到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旅游费资助,去调查馆藏的重要资料。此后不久,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邀请我访问奥斯陆。在奥斯陆访问的一个月间,我对本书的背景及涉及面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并开始撰写一些文章,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那些有待深入研究的相关学术命题。Geir Lundestad 所长和他的手下都是热情好客的东道主。他们主持的各类研讨会及与他们的多次交谈,使在奥斯陆的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愉悦的时光。

自我1997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起,本书的写作被迫搁置了四年。2001年我结束院长的任期,成功申请到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的访问学者项目。2001年9月的第一周,我到威尔逊中心报到,从罗纳德·里根大楼及国际贸易中心的电视机中,目睹了9·11惨剧的发生。虽然灾难过后的华盛顿动荡不安,让人难以专心治学,但威尔逊中心的工作人员及学者们提供的大量资源、支持和信任,依然让我受益匪浅。我尤其要感谢 Sam Wells, Rob Littwak 和 Christian Ostermann,他们使我的访问研究变得充满意义,让我有机会在担任大学管理职位四年后能顺利回归到严肃的治学状态。接下来的2002—2003年中,我被聘请为牛津大学的 Harmsworth 教授;教学之余,有幸聆听了大量讲座和研讨会,与当时最杰出、最著名的几位俄罗斯、苏联政治专家及国际关系、历史方面的作者进行交流,让我获益匪浅。



因此,在结束牛津大学的教职经历后,我觉得时机已成熟,应该把多年以来对本书的研究和思考付诸笔端了。幸运的是,我不久便被选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The John W. Kluge Center)的亨利·基辛格研究员(Henry Kissinger Fellow),并得到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资助。对上述两家研究机构,我心存无限感激,是它们让我能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状态下从容写作,并与各领域的学者和实践家们进行交流。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各路专家对我的研究依然充满兴趣;他们的热情与关注激励我思考本课题对当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含义。和平研究所的 Ginny Bouvier 对我的工作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并对诸多章节作了颇具见地的点评。弗吉尼亚大学慷慨地授予了我多项研究基金。我还想感谢 Chuck McCurdy 和 Ed Ayers 的鼎力协助。

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让本书的出版变成了可能。Mark Kramer 和 Norman Naimark 阅读了本书手稿的倒数第二稿。他们细致的作风及对苏联外交史的深刻理解避免了文本中原有的若干重大错误。他们的概念性理解和分析能力迫使我更深入地对书中的大小概念进行思考。他们对本书手稿倾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让我感激不尽。我还邀请了几位工作中最早结识的朋友们审阅本书稿的全文或部分章节,他们是 Frank Costigliola, Robert McMahon 和 David Painter。这些朋友之前也多次帮我审阅书稿,对本部书稿,他们尽责细致依旧,指出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并发给我相关的新书和文章,供我参考。同时,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们也竭尽全力帮助我这个前任院长重返学术研究的道路,这让我深感幸运。Peter Onuf 是其中作用特殊、才能奇特的一位。他总是先聆听我的想法,再通过新颖的角度,对其中的观点进行概念化再处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某些观点竟能变得如此妙趣横生。和 Peter 共进的每一次午餐都是围绕本书话题的一次研讨会,他会就议题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然后加以总结。他让我理解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价值所在,并鼓励我勇于承担风险。当 Peter 不在时,Brain Balogh 常常就代替 Peter,向我提供理论的养料;他反复告诉我,本书一定能够完成。在我老东家弗吉尼亚大学之外,我的好朋友、哲学家 John Arthur 不断地询问我的想法,并让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John 是我认识的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教我如何从多个角度思考同一个问题。他的睿智提升了我的学术功力和分析能力。Odd Arne Westad 和 Chen Jian 两位学者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他们是苏联和中国问题的专家,虽然学术立场与我有异,但对冷战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大国在东亚及第三世界对抗等议题,他们的见地让我受益良多。此外,本书还得益于 Vojtech Mastny 的独到见解,他仔细阅读了本书的两个章节并提出了高质量的建议。本书手稿即将完成之际,Vlad Zubok 还发来了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戈尔



***** 致谢 *****

巴乔夫章节的宝贵点评。这些年来,我从 Vlad 那里获得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大量信息,本书的很多内容中都闪耀着他的智慧。

在规划本书的结构时,我希望能像从美国的角度关注冷战一样,也从苏联的视角观察冷战。但我也知道,自己缺乏俄语和其他相关语言能力。我努力地尝试弥补这一劣势,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克服,但在他人的帮助下,我依然获益良多。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和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都开始从冷战的“另一方”搜集文献资料,并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发给感兴趣的学者们。他们主办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会议召集各路学者和外交家参与历史讨论,也因此推动了各国政府提前解禁相关历史文献,否则这些文档要到几十年后才能公布于众。2001—2002 年还在威尔逊国际中心访问时,通过 Christian Ostermann 我有幸接触到“冷战国际史项目”历时多年搜集到的文献。还要提到 Tom Blanton,他鼓励我好好利用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家安全档案馆中搜集到的大量宝贵资料。要不是 Christian 和 Tom 的慷慨相助,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完成。Tom 的那些忠诚的同事们——Malcolm Byrne, Bill Burr 和 Svetlana Savranskaya——多次在关键场合伸出援手,并向我提供了他们一直在搜集的来自俄罗斯、中国、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和美国的文献。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我向多位翻译求助。Pierre Du Quesnoy 和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Melnikov 在 2001—2002 年中为我翻译了俄语的文献。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访学期间,乔治敦大学的两名热情的研究生 Isaiah Gruber 和 Anton Fedyashin 继续了翻译工作。他俩和 Svetlana 一道在国家安全档案馆搜寻最重要的资料;与此同时,Isaiah 还奔赴哈佛大学,在 Mark Kramer 的指导下,查询了哈佛大学的俄罗斯文献微缩照片馆藏。老东家弗吉尼亚大学的 Tim Naftali 慷慨地和我分享了他手中的苏联赫鲁晓夫时代各次苏共常委会的会议纪要的英文翻译版本。虽然这些材料不能取代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档案的系统研究,但朋友们提供的翻译材料和帮助,使本书在窥探当年莫斯科的决策时,几乎能达到我分析华盛顿决策时的深度与广度。

许多朋友都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文献收藏,并指引我找到所需的文献。几年前 Kai Bird 把他收集到的 W. Averell Harriman 报告复印件借给我。四处搜寻原件下落,我决定要前往国会图书馆,那里馆藏有全套的报告,我当年撰写关于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一书时,该报告还不对外开放阅览。Kai 还向我提供了他在研究 McGeorge 和 William Bundy 时搜集到的几份关键性备忘录,帮助我把越南战争



放到冷战这个更大的框架下去研究。在文献搜集方面,没有人比 Bill Burr 向我提供了更多宝贵的指导。他对冷战中后期美国方面的资料的了解无人能及。同时, Nancy Mitchell 告诉我,卡特图书馆(Carter Library)藏有一些我最需要的资料,当我忽略了某些关键性材料时,她还和我分享她收藏的复印件。本书因为朋友们的无私帮助而得到极大丰富。

我的学生们,过去的和现在的,也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前当我在撰写关于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那本书时,James Lewis, Laura Belmonte, Nick Cullather 和 Andy Morris 帮我完成了一项关于“民意对美国政府冷战前期决策的影响”的研究。我之前的几本书都引用了该项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本书第一章中,我依然引用了他们研究中的部分发现来充实自己的论证。Erin Mahan 和 Taylor Fain 也努力帮我捕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卡特政府时期民意的走向。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相关章节有所贡献。乔治敦大学一名才华横溢的本科生 Gregory Pope 希望能找机会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他帮我通读了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政府时期《时代》、《新闻周刊》和《国会季刊》等各大主要期刊。他提供的诸多短篇报告和文献复印资料大大提高了我对当年民意情况的了解。弗吉尼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Seth Center, Josh Botts 和 Rob Rakove 也毫无吝惜地和我分享了他们对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认识和研究资料。此外,Seth 还提供了无可取代的帮助,整理出本书的参考书目,并帮助我挑选了配套地图和照片。还有一名工作努力的本科生名叫 Sarah Tuke,她曾写了一篇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政府决策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并把她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献信息赠送给我,尤其是她通过“解密档案参考服务”(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vice)获得的资料。看到学生们日渐成熟、并从他们的智慧中获得启发,这就是教书育人的快乐之处。我实在是幸运至极!

在本书写作的收尾阶段,我有幸得到 Elisabeth Sifton 在编辑方面的大力帮助。十多年前,她帮我确定了本书的概念框架,并在我担任院长及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本书的准备。要求严格又善施援手的她驱使我对手稿中的几乎每个句子都仔细推敲。她提出的问题引导我不断澄清自己的想法、扩大解释的范围。那段日子也是她个人生活中非常艰难的时期,但她仍为本书倾注了大量时间,阅读书稿并提出文本改进意见。我对她感激不尽。

但不论笔者从同事、朋友和学生那里获得了多少帮助,这样一部作品的完成依然少不了来自家庭的爱与鼓励。Phyllis 批判的眼光和思辨的头脑强化了本书的论证并



***** 致谢 *****

让文字叙述更加严谨。她和我们的孩子, Sarah 和 Elliot, 大概都对冷战的话题产生了厌倦, 但他们的耐心、幽默和尖锐让我完成的远不止是一部书稿而已。我感谢他们提供了生活中的美好, 谢谢他们为我创造了如此这般的人生经历。

序言

“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总统乔治·H·W·布什在数年前写道，“这是一场对生活方式的斗争。”

十年前当我着手编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冷战。1989至1990年间，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杜鲁门当局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书，当时的事态发展令我震惊不已。东欧出现了自由政府。柏林墙倒了。德国统一了。苏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减弱了。冷战结束了。我之前从未料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在不到十年前，冷战还似乎刚进入严重的僵滞状态。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陷入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敌对状态。要员提出发动并赢取核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人们读到有关偷袭的报道。这两大意识形态迥异的敌对国心怀恶意，伺机而动，想抓住有利时机占据优势。如果官员没有警觉之心——这是莫斯科与华盛顿通用的语言——敌人便会利用其军事力量施以胁迫。一步退则步步退。同盟国会丧失信心，庇护国则会感到被出卖，世界大国平衡会被打破，而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对民众表示其生活方式已危在旦夕。由此看来，冷战不在未知中延续，便在灾难中终结。

随后，1985至1991这六年间的风云变幻让多数人大为震惊，国际秩序重新进行了势力分布，一场席卷全球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落下帷幕。

怎么会这样呢？重权在握的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历史的进程改头换面。但如果他们能如此决断地做这件事，我不禁要疑惑其他领导人是否也



该有此行动。冷战究竟为什么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果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般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人都能奋力改善苏美关系，他们的前任不也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曾想过走这一步？若是想过，为什么他们失败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成功了？

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档案和回忆录在莫斯科、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北京陆续问世。当我读到众多书籍和文章涉及这些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档案本身，我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惊人事实，该事实常被间谍行动、破坏活动、核震慑与傀儡战争等更为戏剧性的细节所淹没：莫斯科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往往认识到他们的竞争是事与愿违的。他们通常了解冷战的动态发展会有哪些不利因素。他们知道正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对抗，国内资源分配何者为重、何者为次也发生了变化，军备竞赛毫不明智。他们意识到冷战将他们卷入了亚非的内战和地区冲突，而这无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他们明白千里之外的区域危机可能令他们将应对措施升级，这或许会导致局面失控并引发核交火。

一方面，这些新档案指出，冷战中的领导要比我想象中更明晰，或起码更有见识。他们清楚自己正在冒险，也估量了自己所作的权衡。尽管耐人寻味，这同时也令人费神。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这样一场为全人类招致灾难的斗争？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某些资源是国民所需要的，但却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用军备竞赛和傀儡战争以外的方式展现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偶尔领悟到避免、缓解、脱离冷战将会让他们收获颇丰，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而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事态又发生了转变？

人们就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给出了诸多解释。这些解释多着重于位高权重的人，譬如约瑟夫·斯大林这样出奇残暴的人，或是像约翰·F·肯尼迪这样倡导自由与多样性的人，他们大权在握，对世界随时都可以翻云覆雨，这样的人都对我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另一些解释则聚焦于国际体系的势力分布。他们认为，所有政府对国际环境发展态势的反应都超出其控制。他们试图填补权力真空，要不就力争在遍布威胁的危险世界中立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天真的人受罚还算走运的，而不走运的话便会万劫不复。

但是，政府并不仅仅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管理政府的人们一方面足智多谋，而另一方面也不忘记历史。他们的信念与回忆左右了他们对世事的理解，构成了他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在国内外有所建树的梦想。

然而这些人并不总能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重大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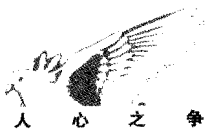
构的制约。倡导民主的政治家们对国内的选民，及立法与行政间的关系很为敏感，他们有时也会关注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集权主义甚至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和具有不同目的和关注的政府机构进行斗争。制定政策时毫不顾及国内选民、政府机构及利益集团，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般的权力真空中行事的领导人。

那些领导人也拥有国外的支持者、正式的同盟者，以及不时地非正式地受到庇护的人，对于有其利益所在的国家，他们极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时而奸猾诡诈，时而真诚无畏。这些同盟国与附庸国从不似表面上那般弱小，大国在谋求霸权时无法不予理会。

为了弄清冷战为何会持续如此之久，我就人类能动的作用进行了思考。我浏览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关注焦点是权力与生存，并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我研究了思想概念、意识形态与历史回忆的影响，思考官员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状况。我权衡了国内舆论、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的作用，在这其中军火业与工业也是相辅相成的。我尝试了分析同盟国与庇护国的角色。我渴望追随证据中的蛛丝马迹，时时考虑到那些对冷战中大国行为的种种看似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这种说法太过天真。这意味着我并没有刻意坚持某一理论，而是易于接受不同思路的解释权。我想考虑所有的理论，用它们与证据相抗衡。

文献资料吸引住了我。1989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新近公布的档案极为有趣，而多数学者在冷战期间从未想过能看到这些内容。它们当然并不完整，但撩人联想。过去15年间，接触俄罗斯材料的机会时有时无。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所翻译的文献。为了接触到美国的档案，我在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耗费了大量时间。通常情况下，25年之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只有少量是对外开放的，而许多最为关键的内容如今则可见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及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收藏之中。这些组织及其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成员组织保有“口述历史”会议，与会的都是冷战中的主要决策人。这些会议的重要文档得到了解密，我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利用。在本书的后几个部分中，我在考察70年代缓和政策失败及80年代冷战结束时用到了这些档案。其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会面的文字记录引人入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讨论的文字记录更是发人深省。倘若我能传达出这些资料的丰富含义，我便颇有成就感了。

可是，本书并不是冷战的叙事史。确切点说，本书研究了冷战中的五个“时刻”，也就是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官员在考虑避免或缓和美苏极端紧张与敌对状态时的短暂



间隙。通过探究他们的动机并分析他们之所以作出那些决策的原因，我希望阐明冷战全局中潜在的发展态势。

我所选取的五个作为例证出现的“时刻”是冷战中耐人寻味的段落。美国与苏联的领导人始终都在与纷繁交错的困扰作抗争。战后欧洲的动乱、亚非的非殖民化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德国(与日本)国力的复苏，这些总体的状况都受到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决策人的关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但他们认为可行的选择也深受他们那些思想观念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形势往往超出哪怕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控制，而由这些形势所引发的对于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是在信念、意识、信仰及经验中形成的。

由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及偶然性很感兴趣，我把焦点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我回顾了斯大林与杜鲁门，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约翰逊，勃列日涅夫与卡特，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布什——在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作出选择之时。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呢？他们是怎样受到局势的限制、盟友或扈从的压力、国内偶发事件的打击、或是信念与历史回忆的禁锢？这些人所努力作出的抉择对他们的人民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能传达出他们在面对压力、思索选择、作出抉择时的感觉。他们那些往往令人感到痛苦的决定远不及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有前瞻性。

这些决策者无法控制根本的发展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破坏，激发了意想不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留下了国际舞台上未曾预见的力量分布，并促使了避之不及的原子能军备竞赛。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亚洲与非洲的人民疾呼独立，向往迅速的现代化，提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言谈，而这无论是其过去的殖民宗主国还是莫斯科或华盛顿都无法轻易控制的。战后重建工作一旦展开，有关德日复苏的问题就萦绕在各国首脑的脑海中。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及欧洲各首都的决策人而言，德国的将来无疑是重中之重。德国是否仍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德国会享有和平吗？

国际舞台发展的含义受到思想原则和历史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塑造了决策者的观点。莫斯科的领导人坚信他们的政府拥有引领美好生活的方案，而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实际上，新的档案资料揭示了，公众演讲与私下谈话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苏联与美国的官员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体现了更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观念与回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构建——他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领导人很难将自己从观念与回忆中解放出来，即使他们知道那样做是明智的。